

迟子建作品精华

芳草在沼泽中



中篇小说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6788001

1247.5

C8122

芳草在沼泽中



1247.5

C8122

中篇小说

673390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芳草在沼泽中/迟子建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迟子建作品精华·中篇小说)

ISBN 7-5006-4642-9

I. 芳... I. 迟...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9257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4349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0.75 印张 3 插页 266 千字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19.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作者近照



序

当我对中篇小说一无所知的时候，我写作了《北极村童话》，那是一九八四年，我二十岁，没有多少知识的底蕴和生活的积淀，有的是满脑子的幻想和一身的朝气。写它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篇幅的长短，只是信马由缰地追忆难以忘却的童年生活，只觉得很多的人和事都往笔端上冒，于是写了外婆就想起了湿漉漉的夏日晚霞，写了马蜂窝又想起了苏联老奶奶，写了舅舅又想起了大黄狗，写了大雪又想起了江水，不知不觉地，这篇小说就有了长度，待我誊抄它时，发现它很厚，大约有三万字了。我吃不准这么长的小说应该算什么，还特意在一本杂志上悄悄计算了一下一部中篇小说的字数，我发现《北极村童话》与它的字数相仿，便知道我在不经意间写了第一篇中篇小说。

为什么能够把一部小说不知不觉地写成了中篇？按我的理解，首先是这素材有了相当的容量，否则，则会由于刻意拉长篇幅，而陷入语言和情节重复的泥淖。其次，一部中篇小说是应该有足够的气韵的，不然的话，它就像一具僵尸一样，让人感觉不到生气。素材我们都知道是什么，而对气韵的理解则会千差万别。以我的想法，如果说素材是一条河流的话，那么气韵就是这河上生成的雾气。河流日日有，而雾气却不是每时每刻都存在的。所以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们每年能看到浩如烟海的中篇，而能留下印象的却寥寥无几。大多数的中篇只是一条平静流淌的河流，它能被人一眼望穿，它缺乏雾气的笼罩，缺乏意境，而意境是作品的精髓，如同一个人的气质一样。

你感觉它是虚无缥缈的，其实它是可以触摸的，很有质感。没有意境氤氲出的气韵，那作品纵然是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也让人觉得索然无味。一部没有艺术气息的小说，同我们每天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些通讯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在写作的时候，尽量不去考虑我写出来的是中篇还是短篇，其实写着写着，它们各自的轮廓就会显现出来。该是短篇的你无论如何也没激情写长，该是中篇的你也无法生硬地遏制其发展，它们肯定会自如地找到应属于自己的形式的位置。

本卷的中篇，我侧重收入了三篇近作：《芳草在沼泽中》、《疯人院的小磨盘》和《鸭如花》。当我写这篇序的时候，《芳草在沼泽中》还没有发表，它将在 2002 年第一期的《钟山》杂志刊登，届时这本书也快出来了，我特别想让我的读者了解我的最新的创作情况。至于今年发表的另外两个中篇新作，我则说不清哪一篇更出色一些。比较而言，我觉得《鸭如花》的人道主义关注更深一些，而《疯人院的小磨盘》写得更灵动和自如一些。这两部小说已被许多报刊转载，如今把它们放在一处，也算是一个比较和鉴别。其余的几篇，《日落碗窑》和《白银那》属于同一时期的作品，它们的故事是鲜活、生动的，因而当年一发表，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所以很多评论家在评价我的小说时，都不由自主地提到它们。事实上，我觉得丰沛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作品在艺术上的某些粗糙之处，这种痕迹在《白银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比较而言，我一直认为我写得比较成

功的中篇是《秧歌》、《原始风景》、《向着白夜旅行》和《五丈寺庙会》，这些作品如今读来，仍然能够感觉到那股浓浓的艺术气韵，是不太会让我在重温时脸红的作品。不过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把它们都一一收入了。至于为读者所陌生的《无边水色》，是我九年前发表在《漓江》的作品，连我自己都把它忘却了。这次在旧刊物中发现了它，便迫不及待地把它读了一遍。我还是格外怀恋那作品中洋溢着青春气息和忧愁气息，它所表现出的那种敏感、单纯和忧伤，不是现在的我所能完成的，因而愈发显得珍贵。把它收录其中，也是为了纪念二十几岁的那段激情洋溢的写作年华。

我在一篇创作谈里说，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裁缝和染匠。这个裁缝喜欢到生活的缝隙中去拾捡一些在常人眼里可能被视为无用的边角废料，把它们一一地积攒起来，期待有朝一日忽然能抽出几块布角，把它们连缀在一起，做出一件按自己的意愿设计的服装来。在裁剪和缝制的过程中，作家又会不知不觉地充当染匠，把衣服染成自己喜欢的颜色，那就是作品的气韵了。比如原来的布角可能色彩过于苍凉，我会给它些许的粉红和嫩绿作为点缀；而原来过于花哨的地方，我又会给它加入一些偏冷的色调，使它显得庄重一些。

其实有些色彩俗得不能再俗的时候，是一种到了极致的“雅”，我渴望着有一天能染出这样色彩的作品，给我的读者以新的惊喜。

序	
芳草在沼泽中	1
疯人院的小磨盘	60
日落碗窑	114
秧歌	165
白银那	210
无边水色	257
鸭如花	292

芳草在沼泽中

回龙观酒馆，我每坐一回都要惹一次是非。这酒馆在紫云巷的尽头，是一座平房改造而成的。它的门脸有些灰暗，不似其他的酒馆有着金光灿灿的牌匾和鲜艳的招幌。它这里也没有什么名厨，不经营鱼翅、大闸蟹、蛇和鳖等奢侈食品。它所有的，是那股朴实的家常气息，炒个渍菜粉啦，炆个土豆丝和芹菜啦，煎几条黄花鱼啦，等等。稍微阔气一点的菜，也不过是小鸡炖蘑菇、豆瓣酱干烧鲫鱼、鸭子炖土豆、辣椒炒鳝丝。来这样的酒馆吃饭，你的心会很妥帖和放松，不用担心兜里的钱在买单时羞涩，不用介意你的吃相是否文雅。在这里，你可以大声说话，可以放肆地猜拳行令，可以和那个绰号叫“臭鱼”的跑堂的无所顾忌地针砭时事。酒馆的桌椅很不讲究，它们是主人从旧家具市场花低价搜罗来的，一个个笨头笨脑、满面沧桑的模样。由于它们不苫台布，你能清楚地看到桌面的划痕、松动的木节孔以及烫伤或者烧伤的痕迹。桌面的裂缝更是比比皆是，这些藏污纳垢的裂缝又是苍蝇最喜欢钻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你刚坐下来，先行欢迎你的往往是从裂缝中抽身而出的苍蝇，它们就像你约来的先期而到的客人一样，绕着你嗡嗡地飞着，寒暄个不休。

靠窗的位置，在回龙观酒馆是最抢手的。这是因为，从窗口，往往能看到暗娼的影子。她们一般是傍晚时才出现。我前面

说了,回龙观酒馆在一条巷子的尽头,尽头的地方永远是危险生活的温床,因为它不惹人眼目,安全性较高。这些暗娼是为着回龙观的客人而出现的,所以她们看上去就像是酒馆放在窗外的摆设。如此,选择窗前位置的人就要多付出一些钱来,名为“买桌费”,类似于大酒店的包房费。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男人要了窗前的位置就是为了瞄上一个女人、从“胡涂乡”出来就进入“温柔乡”,有的人纯粹就是为了好奇,想看看这些女人是什么样子,就像西方人看“秀”一样。当然,大多数的男人在夜晚要了这样的位置,是专为了窗外的风景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着一个酒客要的几样菜还没有怎么动,可他却急着“结帐”了,就知道他看上窗外的某个女人了。这种时刻,你给他结算酒钱时就要动作麻利,否则会令客人发窘。在回龙观酒馆,人们不把付酒菜钱称为“买单”,他们还沿袭着老习惯,叫“结帐”。客人会吆喝:“哎,丫头,结帐了!”这里的服务员不像别处通称为“小姐”,而是叫丫头,也的确就是丫头嘛,她们个个长得很茁壮,脸庞红扑扑的,笑容憨憨的,裙子下面露出的小腿粗粗的,说话时嗓门都很大,据说这与回龙观主人的审美眼光有关,他不喜欢那些杨柳细腰、皮肤白皙、说话嗲声嗲气的小姐。

回龙观酒馆的墙壁,与其他酒馆也是不一样的。它没有悬挂一幅画,而是吊着一串串的蒜辫子。这些大蒜即是装饰,又可以为客人所食用,两全其美。还有,墙壁上吊着形形色色的农具,如镰刀、锄头、镐头、耙子等等,布置得就像农业展览馆的一角似的,仿佛是在提醒客人,别忘了你吃的东西是由劳动换来的。进得酒馆,你能听见此起彼伏的说话声,能闻到灶房里炆油锅的气味,能听见录音机所放出来的热热闹闹的二人转,真是俗气而又亲切,烦扰而又温暖。去大酒家,坐在水晶吊灯下的华丽餐桌旁,面对着精致的餐具,面对着侍立在一旁随时帮你斟酒和更换食碟的小姐,你会觉得浑身不自在,不是你在吃饭了,而是饭在吃你了,真的不如到回龙观这样的酒馆来得实在和惬意。

先说我在回龙观惹的第一桩麻烦吧。那还是四年之前，我第一次被老吴给拉到这里。那是一个夏日庸碌的黄昏，我正愁晚上没地方吃饭呢，老吴叫住我，说要请我吃饭，我愉快地答应了。我是一个单身汉，早餐就是一边走在上班的路上，一边顺路买两根油条对付一下。午餐不用说了，是在单位吃千篇一律的盒饭。那盒饭里的鱼肉散得像旧棉絮，青菜的颜色就像老妓女的脸一样黯淡，肉条裹着黏黏糊糊的芡粉，真的是难以下咽。只有晚餐，我才吃得相对有模样一些。我会回到住所，下碗清淡的面条，或者是调碗鱼汤喝。当然，有的时候太疲劳或者是情绪低落，我干脆就买上几个包子当作晚饭了。在去回龙观酒馆的路上，老吴讳莫如深地对我说，在那里吃饭，跟在外国似的，因为它的窗外就是隐蔽的“红灯区”。老吴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个子跟我一样矮小，但他不似我这样干瘪，而是胖胖的，满面油光。也许是在机关工作过久的缘故吧，他过早地谢顶了，肚子微微腆着，由于腰椎间盘突出，他总是不由自主地佝偻着腰，这使他看上去更显得矮小。平素在班上，他矜持、严肃，以致看上去有些刻板。他是我的“头儿”。我们这个隶属于市委机关的处室，总共五个人，老吴是处长，近年五十的张亚玲是副处长，我、小米和小姚是科员。我们的工作就是为市委领导写各种会议的讲话材料，所以我们处室所订的报刊是机关里最多的。小米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一边哼着歌一边用剪刀哗啦哗啦地剪报纸。她在剪之前要大致把报上的消息浏览一遍，看看哪些讲话和社论对我们写材料有利。天下文章一大抄，尤其是我们所写的那些讲话稿，基本是从这本书上抄一段理论，再从另一篇社论上抄一段议论，真正属于自己的话没有多少。这种工作很像农村妇女打裕襟，把一块块大大小小的布角连缀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熬了不知多少日夜写出的、几经审阅才通过的重大会议的讲话稿，领导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一读完，就迫不及待地把它扔在一旁了。让我觉得这稿子在没出炉前是宝贝，一旦它露出头来就沦

为了弃婴。而你看下面听会的人呢，他们有的眼神直直地盯着主席台，而心思却不知飞到哪里去了；还有的低头悄悄看着被调到振动状态的手机的来电显示或者是新收到的短消息；更有甚者，干脆打起了瞌睡，直到报告结束时惯例响起的掌声把他给惊醒。看着这一幕幕情景，真是令人痛心啊。所以，我们很少到会议现场去听报告，那样你会觉得自己从事着天底下最无聊最滑稽的工作。第二天，你能够在报纸的显赫位置上再看到这篇稿子，不过它的署名已经是某位领导的署名了，它跟我们仿佛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老吴的家庭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还有一个在上海读大学的儿子。他和做小学教师的老婆的工资加起来也不过两千块左右，所以他平素是极为节俭的。他穿着从夜市买来的廉价的西装，抽两元钱一包的香烟，喝便宜之极的茉莉花茶，骑自行车上下班。那天，老吴却把自行车扔在单位，破例打的士带我去酒馆，令我好不感动。路上，我说回龙观的名字很耳熟，似乎是哪里的地名。老吴说，就是北京的回龙观嘛，这酒馆的主人有个要好的同学，他是个画家，后来去北京求发展，住在回龙观，因为他的画不被人接受，穷困潦倒的他就自杀了。为了纪念他，这酒馆的名字就叫回龙观了。

回龙观酒馆在城西，那里几乎就是郊区了。一下车，老吴就嘱咐我，碰到一个高个子跑堂的、外号叫“臭鱼”的男人，千万少和他搭话，他有点魔怔。你若和他聊上，得，一夜你也别想逃出来，在对某件事的议论上他如果不占上风，情急之下他会把桌子给你搁了。老吴还特别叮嘱我，别跟人说自己在市委机关工作，我们这种工作性质的人来这里，若是传出去，会引火烧身的。他的话我并不以为然，因为我来的是酒馆，又不是黑店，即便是能够从窗外看到娼妓游动，我洁身自好、并不染指她们，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呀。

回龙观酒馆给我最初的印象并不好，它的低照度灯光给人

一种没吃饱饭的感觉，虚飘飘的。一进去，只觉得到处都杂乱无章的，桌子摆放得很不规矩，东面放着一张小方桌，留着许多空地，西面却挤挤插插地摆了两张大圆桌，令人行走都困难。只有窗前的桌子还算顺眼，在一条直线上，而且间距也比较均匀。还有，墙上挂着的农具十分扎眼，看上去就像凶器一样充满了恐怖感。当然，当你喜欢上了这里之后，就会觉得那桌子乱得很别致，那农具挂得恰到好处。

老吴看起来是这里的熟客了，他一进来，有个肩搭一份报纸的店小二就冲他吆喝：“哎，你这一段跑哪里发财去了？”老吴冲我眨眨眼，我便明白他大约就是“臭鱼”了。那份报纸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做成了红色，所以感觉这店小二的肩头就像挂了一串红果子在卖，十分有趣。老吴笑着回答：“我这一段不在鞋店干啦，搞传销去了！”老吴哈哈大笑，与平素判若两人，真令我吃惊不已。我们拣了靠窗的最后一张桌子坐下来。店小二跟了过来，指着我说：“行么，还配上了个保镖，钱挣海了吧？”老吴顺势说：“就是，我现在满屋子都是钱，以后下雨阴天时你得去帮我翻弄翻弄，别捂长毛了！”

酒馆里的食客没有一个是安静的。他们有的挥舞着胳膊叫着“哥俩好呀，五魁首呀”在划拳，还有的唾沫星子四溅地在激烈地争论着什么。即便是那些不出声的人，也因为录音机里放出的亮堂堂的二人转，而显得他们也仿佛在说着什么。二人转那种放开了嗓子的唱腔非常透亮，它的唱词很生活化，有些俗，有些肉麻。但正是因了这俗，它让人觉得亲切，因了这肉麻，给人平添了一种温暖感。老吴在点菜的时候，我已经有些喜欢上了这里。因为这里的人放纵、无所顾忌、互不注意，在这里可以开怀大笑，可以乱弹烟灰，甚至于可以把臭脚放到桌子上。它的闹哄是一种敞开了心灵的闹哄，它的家常的、底层的气息，让人有在月下漫步的逍遥感。

菜上来的时候，天已渐渐黑了，临窗位置的人都把目光放到



窗外。果然，我在黯淡的灯影下看到了三个游动的女人。从她们的体态上看，一个似乎老了些，因为她的背影看上去臃肿不堪。另外的两个则苗条得多，想必应该比较年轻吧，因为她们一个披着长发，一个则高高地吊着马尾辫，年老色衰的女人大约不会如此打扮的。胖女人穿着直筒式长裙，苗条的女人则穿着袒胸露臂的吊带裙。她们在酒馆的窗外走来走去，微垂着头，就像是丢了什么东西在寻找似的。我很奇怪，她们为什么总是把侧脸给我们，既然是做这种生意的人，又有什么含蓄可讲呢？老吴听了我的话，用筷子点着我的脑门说：“亏你还是念过大学中文的人呢，连这点道理都不懂，什么是美？朦胧就是美！模糊就是美！若隐若现就是美！稀里糊涂就是美！”老吴激动了，他的嘴角因此而有些歪。我发现酒馆里的女食客难得一见，零星的几个也没有单独来的，而且她们也不坐临窗的位置，她们的身边基本都跟着一个男人。我不知她们若是看了窗外的女人会做何感想。

随着夜色越来越深，酒馆的生意也就越来越火爆。窗前的男人换了一批，而窗外的女人也换了一批，最开始游荡的三个已经消失了，新出来的女人看上去更加妖娆、风情万种，有一个女人竟然在自己身上披挂了闪烁不休的彩灯，好像一棵圣诞树似的。灯一闪，她的身影也跟着闪，使人疑心她是天外来客。她们似是漫不经心地走来走去，完全就像一个个出来乘凉的人在看星星。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回龙观的灯火这样迷离，那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剧场，它的剧目每时每刻都在上演，当然它的灯光要虚目以待了。老吴的酒喝得很冲，他一遍遍地感慨着：“生活啊——”，给人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我见他有些失态，就提醒他少喝点，上次市委机关的人年终体检的时候，老吴查出了高血压、血稠、脑动脉硬化的毛病。我的话才出口，老吴就不无调侃地说：“到了我这把年纪，是该硬的地方不硬，不该硬的地方却硬了！”他说出如此粗鲁的话，令我震惊。接着，他用伤感的语气告诉我，他兢兢业业地工作了大半辈子，给领导写材料，快把脖子

都写直了,他听老婆说,有时晚上做梦他还大段大段地朗读社论呢。这次市委宣传部倒出个副局级干部的位置,领导已经事先找他谈话了,说要提拔他,可是第十一中学的一个比他年轻十岁的校长却意外把他给顶了,他说虽然说明天才公布这条消息,但他今天什么都知道了。老吴很委屈地说,那个校长的老婆是开酒店的,家里很有钱,他听朋友悄悄告诉他,人家的钱起了关键作用。老吴还说,如今这世道,你要想走仕途,要么有钱敢送,能使自己青云直上;要么你就“上面”有人,关系硬,谁都拿你高看一眼。至于人品和才华,那都是狗屁!其实我听小姚和小米私下议论过,他们说老吴要被重用了,而我对此类事是漠不关心的,我平素关心的是谁能够嫁给我这个无钱无权又无貌的人,使我回家时能够喝碗热汤。我明白了老吴为什么请我,他原来要找个人倾诉一下苦闷和失意呀。我劝老吴,提不提那半格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照旧过日子?老吴义正词严地纠正我:“我当然不一样了!首先吧,因为你的级别起来了,别人就高看你一眼了。你的待遇也就改变了,上下班不用骑着破自行车闻着臭烘烘的汽车尾气了,生病住院时也可以进高干病房了。而且,你报销个什么也方便多了,你说现在哪个干部出来吃饭是花自己的钱,也就我们土鳖吧!”老吴越说越激动,后来他眼睛湿润了,声音哽咽了,我只能又叫了一瓶酒,陪着他喝。他的舌头开始不听使唤了,他说之所以找我来,是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孤儿,在精神上能理解他。他还劝我如果有别的门路,干脆换个单位工作得了,他说自己写了大半辈子的假话和空话,有时觉得活着跟死了没什么区别。他如此对我敞开心扉,使我深受感动。

我的第一次麻烦就是这时候惹的。也许是多喝了点酒的缘故,抑或是我为老吴的遭遇有些愤愤不平,当我听见店小二“臭鱼”吵吵嚷嚷地与人辩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时,我不由怒火中烧,骂他:“我们到你的酒馆是为了图快活的,哪个孙子再敢谈时事,老子就割了他的舌头!”臭鱼闻讯后就伸着舌头过来了,他晃



着脑袋,把一把尖刀横在我面前,意思是你有本事就来割我的舌头啊,一副挑衅的姿态。我有些慌张,但故作镇静地拿起了刀,并且慢吞吞地站了起来。我巴望着有人上来阻止我,可是周围的人都在有滋有味地吃自己的酒,没人理睬我们,臭鱼有恃无恐地叫嚷着:“割呀,割下来让大师傅当盘菜炒了,好给你当下酒菜!”臭鱼的舌头由于伸的时间过长,开始滴答滴答地往下流涎水,流到了老吴的脸上,老吴就势“嚯——”地站了起来为我解围,他冲臭鱼骂道:“谁他妈的往老子头上滴哈喇子?”臭鱼缩回了舌头,他没有和老吴理论,他斜着眼睛义愤填膺地指着我说:“你小子是不是中国人,中国人不关中国国人的事,那还叫人么?”他铿锵有力地把“人”念成了“银”。我也上来了虎劲,我抢白他说:“你一个臭跑堂的,关心国家大事有个屁用!谁听你的,还不是瞎叫唤!”臭鱼被激怒了,他随手从桌子上拿起一块盘子,扔到我脸上,幸亏我躲闪得及时,没有被它划破了脸,但是从盘子里飞旋而出的麻婆豆腐却溅了我一身。我以牙还牙,也把一块盘子撒到臭鱼身上,那是还剩半盘的鱼香肉丝,灶房的师傅把它做成了金红色,你能想象臭鱼的白围裙有多脏了吧。那一刻他愣了,但随之就进行新一轮的反击。于是乎,碗盘交替着飞旋,我们就像魔术师在表演杂技似的。即使如此,酒馆仍然秩序井然,该望窗外的男人还是望着窗外,该猜拳行令的人依然在挥舞着胳膊,偶尔有人漫不经心地朝我们这打量一眼,然而他们很快就转回了头,仿佛这种事在这里是司空见惯似的。录音机的二人转唱得火辣辣的,有人和着旋律摇头晃脑地跟着唱着,好不自在。老吴见我真的和臭鱼打起来了,就顾不得伤感了,他连忙呵斥住我,对臭鱼说:“我的弟兄你也计较,真是不给老哥面子。”臭鱼梗了梗脖子,正要申辩什么,一个女服务员从灶房伸出一张红润的脸吆喝道:“臭鱼,你瞎闹什么,上菜了!”臭鱼就骂骂咧咧地进了灶房。老吴对我说,臭鱼原来异常精灵,高中快毕业时得了场脑病,从此智力锐减,大不如从前。他家给他找了一

个差事，在一家文化单位的收发室分管信报的收发，他在那里养成了看报的习惯。别人订阅的报纸还没看呢，他就会用那双又脏又油的手把它们翻得污渍斑斑、皱皱巴巴，令那些多数有洁癖的知识分子大为不满。臭鱼最留意的就是国家大事，他对柴米油盐、男欢女爱的事情漠不关心，完全像“五四”时期的热血青年，忧国忧民，愤世嫉俗。回龙观的主人和臭鱼是小学同学，他了解到臭鱼因为一天到晚只是哗哗翻报，他所在的文化单位的收发室不愿意要他了，而臭鱼生病后的愚钝又符合他用人的原则，就把臭鱼招到回龙观当跑堂的。臭鱼很喜欢这份工作，他做得兢兢业业的，只是仍然改不了看报的习惯，每天都要去报摊买上几份报纸，一有空闲就看。所以你有时候所看到的臭鱼，肩上往往搭的不是白毛巾，而是一份报纸。

那天深夜结帐的时候，臭鱼大步流星地朝我走来，他说：“咱俩摔的那些东西，都记在了我的帐上，你放心吧。”这时我忽然觉得臭鱼是可爱的。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朋友，虽然我每去回龙观都要有麻烦，但再没有是因为臭鱼而引起的。

以后的几年在回龙观所发生的种种是非恩怨，容我其后再拣些有趣的见缝插针地说给你听，现在让我告诉你刚刚惹的一桩是非，我在酒馆把我的女朋友司马林秀给打跑了。自从她父亲去世之后，我们的关系就一天比一天紧张。她的母亲，那个其貌不扬的家庭妇女，她原来总是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非常的谦恭和随和，可自从她那做历史研究员的丈夫去世之后，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年近六十的人一下子挺起了腰杆，或者换一种说法是，她真正活了起来。她比以前活跃了，她穿花里胡哨的衣服，而以前她只穿青色和老绿色的衣裳。她还把短发给烫成鸡窝状，脸上拍了白粉。不过白粉涂抹得不够均匀，那脸就黑一块白一块的，使之看上去像个被太阳晒得皱巴巴了的花脸蘑。司马先生在世时，她还细心侍奉着公公，可是司马先生一走， she 就把公公送到了司马先生的弟弟家，她说亲生儿子养老人是天经地义

